“两个离不开”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恩起

“两个离不开”是指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两个离不开”，不仅科学地概括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平等联合、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发展趋势的深刻揭示，而且还为我们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贡献。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相国辽阔的土地上，除汉族外，还有许多兄弟民族。民族众多，民族关系自然就复杂。不过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中，有一种基本关系，这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是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条主线。这是因为，汉族自形成以来，在历史上就一直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活动中心虽然是中原地区，但人口却遍布全国各地。而少数民族则不一样，基本上都聚居于一个面积个或大或小的区域范围内，而且大部分是在边疆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错聚居，在地理上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辐射型民族关系网。因此，无论是全国范围，或是区域性范围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历代都发生直接联系，存在各种密切交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我国的统一之所以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聚合力之所以逐渐增强而不是减弱，就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5页），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各种交往从未间断过。例如，在经济上，古代中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冶金、制陶、养蚕缫丝等方面发展最早，而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疆地区，在畜牧业生产技术方面则居领先地位。汉族和少数民族有着各自的经济优势，加之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于是民族间逐步进行着各种形式的经济联系和物资技术交流。汉族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逐渐传入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经验也不断传入汉族。经济交流的结果，不仅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且奠定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坚实基础。又如，在文化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从未就是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除各具传统和特点外，都吸取了对方的精华。正是各民族人民在文化上的交光互影，相互借鉴，中华民族的文化才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文化的长期交流，是形成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一条纽带。

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起来的，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统一国家，共同发展祖国经济，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共同开拓和保卫祖国疆土的奋斗过程中，逐渐培育出来的。如果没有上述进国素的长期影响，没有历史发展合力的作用，也就不可能形成今天这种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了。

历史发展使汉族和少数民族越来越需要互相依存。但是，“两个离不开”关系的最终确立以及它在内容上的丰富和发展，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团结奋斗、建立新中国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新中国诞生后，随着民族压迫制度的彻底废除，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关系，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政治方面看，在民主革命阶段，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开始平等联合，团结奋斗，共求解放，共建国家。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指出，“蒙、回、藏、维、苗、瑶、彝、黎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之下，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因而，“两个离不开”就迈向了更高的目标，即各族人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合作，互相帮助，共同维护和发展祖国的统一事业。毛泽东同志说，“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自己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4页）汉族也极大地帮助、支持了少数民族。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来和少数民族地区播下革命火种，到人民解放军和汉族民族的省、区，结成对口支援和互相协作、横向联合的关系，从而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政治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瞭望》1982年第12期）这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文化方面看，在新历史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相互相离不开的关系，也由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历史任务而越来越密切。发展各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各民族的科学和思想文化水平，除各民族自身的努力外，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各民族间，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学习、交流、支持和帮助。以学习语言文字为例，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汉语文历来是汉族广大人民进行生产活动、社会活动与科学实验的重要交际工具，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文字之一，因而各少数民族学习和掌握汉语汉文，就成了发展本民族科学文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汉族来讲，要减心向少数民族学习和真正帮助少数民族，也必须学习和掌握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所以党和国家积极提倡各民族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和文字。为此，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这一点今天还为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认。

总之，“两个离不开”高度地概括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本质特征，深刻地揭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内在联系，充分地体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利益，是一个经过历史长期检验的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我国各族人民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及党的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很快便认识和接受了这个真理，并且成了自己在实践中坚确处理民族关系的行动指南。

但是，现在也有少数人在思想上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如有的人对来疆参加开发、建设的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们，不仅不表示欢迎，而且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有的人甚至提出“反对各类人员进入新疆”的错误主张，等等。这些都是与“两个离不开”思想背道而驰的，是违反党和国家对内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的，是不符合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的。这些错误如不及时克服和纠正，必然要妨碍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影响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损害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事业。正因为如此，这些错误一出现，便遭到全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反对。

汉唐时期新疆繁荣的历史启示

叶鸿春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内地有着广泛而密切的交往和联系。汉唐时期，新疆的经济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这一时期新疆繁荣的历史，感受及其原因，对于加速新疆的四化建设，开发新疆，建设新疆，颇有益乐。

西汉以前，新疆尚处奴隶制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汉朝统一西域后，随着中原地区屯田士卒、应募农民的不断到来，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传入，铸地面积不断扩大，新疆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农作物和畜产品的种类以及产量十分丰富，五谷在许多地区自给有余，还盛产葡萄、石榴、百蓿及其他良果和药材。《后汉书》在提到当时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时，说那里《田地肥广，草木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不贵中国而粮食自足》。于阗国的西域、精绝国的精绝城（在今民丰境内）、渠勒国的鞮都城（在今策勒县）等都是当时最大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在于工业上，莎车、楼兰等地区已能冶铁、冶铜，龟兹还出铅。不少地方都会用铁制造兵器和工具。还出现了专门从事制作铁器的手工业者。解放后在库车、和田、民丰等地先后发现汉代冶铁遗址和大量铁制工具的残片，其形状与内地相同，说明相国内地先进的冶铁技术这时已传入新疆。此外还有玉器加工、酿酒、毛纺织、制陶等手工业，有专业的陶工，陶器在考古中的发现已不足为奇，史书称当时“西域殷富，多珍宝”。随着丝绸之路的形成与中西交流的畅通，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汉书·张骞传》记载，当时的新疆，“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后汉书·西域传》描述当时的情景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天山南路的楼兰、龟兹是转运和销售丝织品的一个繁华重要市场。由于大量丝织品经西入运销天山南北，同时又大量运往中亚各地，因此，从这时起新疆因“丝绸之路”而驰名于世。1977年，在今和田东南的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中一次就发现四十五公斤西汉五铢钱，可见当时商业贸易之发达。

两汉时期，新疆的文化亦有显著的发展。从张骞通西域起，中原地区的文化在新疆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龟兹王曾在龟兹（今库车）建立汉族式的宫室，模仿汉朝的礼仪。西汉末年，莎车王曾以侍子身份在长安住了很久，返回新疆后模仿实行汉朝的政治制度。内地的纸张在东汉时就传入新疆，提供了书写文字的材料，为当时新疆文化的发展、繁荣，增添了色彩。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唐代，新疆经济文化的繁荣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农产品为例，品种已经相当齐全，麦、豆、稻、小米、黍等应有尽有，蜜梅、甜瓜、桃、梨、杏之类美到处可见。棉花、蚕桑产量可观，屯田土地达二千八百顷。在吾曹陆式储古城和唐王城屯田遗址中，至今仍可见当时的非多仓库和地窖，其中存有麦面、小米、高粱、胡麻等。在唐王城遗址中，发现了很大的石碾盘方和铁制工具。为兴修水利，当时还设有专管水利的机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安定，商业贸易的活跃比起汉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史料记载，在当时的和田地区，南来北往的商队络绎不绝，商人中本地人、汉族人、欧洲人、印度人摩肩擦踵；市场兴旺，商品繁多，价格稳定。手工业方面，铁、铜、金、银、铅、锡等金属的开采、冶炼与加工以及毛纺织等技术比以前更加发达，如阿克苏的毛纺织品就负有盛誉，东销内地，西销中亚，颇受欢迎；还如，玉器制作种类繁多，唐朝宗即位初年，派给事朱如玉到和田求玉，除收集到大量天然玉块外，还收到玉、阿鼻、帝肺、臂等各种玉器百斤，可见当时和田玉器手工业发达水平。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当时较大的城镇北庭、龟兹、疏勒、于阗、焉耆、高昌等地以及这些城市与内地之间都有通途大道，设有馆、驿；还设“车坊”专门负责物资运输。唐诗，“无数钟声遥过碛，应驮白雉到安西。”就是对当时天山南北商旅繁忙热闹景象的描写。经济的繁荣，还使地广人稀的新疆人口迅速增长，以伊州（今哈密）为例，唐初只有一千三百多户，至唐末增加到二千六百多户，增长了整整一倍。

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繁荣。许多民族这时已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不少文化成就达到很高水平。如疏勒人裴楚珠所著的《一切经音义》一书，在研究汉语文方面价值相当高。维吾尔人饮景尔写的汉文诗，体裁与当时流行的唐诗完全一致。丝画艺术多种多样，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雕刻与彩塑也令人赞叹。天山南麓石窟寺艺术就有不少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

汉唐时期新疆的经济文化能够出现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发展景象，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两点是缺一不可的。

一是新疆与内地政治上的统一。公元前六十年，西汉在乌垒（在今轮台）设置西域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及帕米尔地区的“三十六国”，新疆开始正式成为相国的一部分。东汉建立后不久即承续西汉重设西域都护府。在唐代，新疆与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有些地方与内地一样设州置府，推行中央政令。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使新疆与内地连为一体，社会局面安定团结，为内地和新疆各民族的合作开辟了广阔道路，为新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为新疆当时的繁荣提供了重要前提和可靠保证。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的统一，汉唐时期新疆的繁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二是新疆与内地以及中亚西亚等周围地区的交流和联系广泛而又全面。新疆地处欧亚腹地，既是祖国的一部分，又是内地连结中西亚的中间环节，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正是由于当时新疆与内地以及中国亚的交往和联系不断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相互割据、划地为牢、自我封锁的状况，以较快的速度克服了自身的落后，才有汉唐时期的升平景象。

当前，新疆和全国一样，正处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时期。1983年，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新疆时指出，开发大西北，首先要开发新疆，要把新疆建设成为我国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的基地。根据中央的要求，自治区党委制订了到本世纪末实现我区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华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将使新疆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各族人民的生活获得较大提高。但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也需要政治上的高度统一。首先，我们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断加强各民族的团结，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拥护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开发建设新疆，实现新疆的四化才有重要的政治前提和保证。

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落实对外开放政策，主要是加强与内地兄弟省市的交流与合作。这也是新疆经济文化能否更快发展、四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繁荣能否实现的关键性环节。这就要求我们冲破过去那种闭关自守、自我封闭、墨守成规、夜郎自大的思想的束缚，抛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念，进一步解放思想，广泛而全面地与内地兄弟省市进行各方面的交流和联系，引进内地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鼓励内地各省市向新疆投资，搞好联合合作，吸引大批内地人才和他工巧匠来新疆工作。同时积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

邓小平同志指出，“搞建设关起门不行。关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际，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所以我们提出，要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快一些，就是要对内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邓小平同志的话，指出了搞闭关自守的危害，说明了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疆地大物博，人口稀少，资源丰富，有着发展的巨大潜力。解放三十多年来，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基础差，底子薄，起步低，发展慢，与内地先进省市相比，还比较落后，差距很大。要搞好新疆的四化建设，加快新疆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新疆，单靠新疆自己的力量就很困难。这就更迫切需要进一步搞好新疆的对外开放工作，才有希望早日把新疆建成我国二十一世纪四化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

我们应当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何时何地都自觉维护祖国统一，使新疆的开放步子迈得更大些，形式更多一些，方法再活一些，不这样做，就会贻误时机，延缓新疆四化建设的步伐，拖全国四化建设的后腿，但是，现在却有那么一些人从狭隘的民族情绪出发，要求所谓“真正的区域自治”，反对中央的统一领导，甚至要反对国家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求所谓“真正的区域自治”，反对中央的统一领导，甚至要反对国家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错误的根源，都在于对祖国的统一，对国家的主权，对中央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民族政策等，其实质是反对祖国统一，反对新疆对外开放，将新疆重新封闭起来。这是极其错误的，若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做，新疆只能越来越贫困落后。这些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十足的糊涂，这是完全违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不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意愿。新疆各族人民是决不答应的。

民族团结民族政策民族观讲话材料 七

昆仑深情

刘畅途

民族团结史话

新疆与祖国的关系，渊深流长。新疆各民族与内地人民的联系也是岁月沧桑，年代悠久，很早就开始了友好往来，情同手足。在昆仑山北麓的古代文化遗址，就出土了不少这一方面的珍贵文物。此外，在我国古籍中也记载了大量的德人的传说故事。有黄帝巡游四海，登昆仑，筑宫室，与“西陵氏之女”缫组结为夫妻的传说，有尧帝与舜禹治水的传说，有尧沙流沙，神受益地图和禹学于西王母的故事等等。在所有传说故事中，以《穆天子传》记载的周穆王到昆仑山会见西王母的故事最动人，最富有美实性。

周穆王亦称穆王，名满，是周武王的孙子，约于公元前九世纪时在位。他在位期间，西周的奴隶制发展到鼎盛时期，国家安宁，四鸾皆归，于是游兴勃勃，命“善驭”者造父陪同，乘八骏马之车，来到昆仑之丘，朝拜圣地黄帝之宫，并与当地管领西王母会见。

昆仑山又名西王母之山，是西王母之民所居地，这里“宜风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山海经·大荒西经》）这里风食之邦随手可拾，甘露之水尽情饮用，也是迷人的传说故事。周穆王会见西王母时，将所带的白圭、玄璧以及缕罗绸缎送给了她。西王母接受了这些丰厚礼品，并在“瑶池”之畔设宴招待他。酒过三巡，西王母诗兴勃发，即席作诗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敝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也即席答诗，“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惠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气吠啦治，一个希望在有生之年多见几次面，另一个表示三五年能来一次叙叙衷肠，诗言志，表现了双方都希望相互学习、友好往来的良好愿望。

宴罢酋堂，周穆王感慨万千，亲自在昆仑山种下一株槐树，立起一块石碑，令人刻上“西王母之山”几个大字，作为这次访问的纪念。西王母对周穆王的诚挚感情，也万分感动，遣鳙自己所处的社会还比较落后，贵族阶的制度，表示就是死后也要作仆“帝女”，去东土与穆王见面。

周穆王告别西王母后，还继续西行，升昔山，望四野，赞美西域山脉逶迤，草木硕美。他会见当地居民时，赠送给他们“贵金四十镒，贝带五十，朱三百贯。”当地首领取以及娘罗绸缎送给了他。西王母接受了这些丰厚礼品，并在“瑶池”之畔设宴招待他。酒过三巡，西王母诗兴勃发，即席作诗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敝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也即席答诗，“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惠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两个离不开”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绳起

“两个离不开”是指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两个离不开”，不仅科学地概括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联合、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发展趋势的深刻揭示，而且还为我们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贡献。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除汉族外，还有许多兄弟民族。民族众多，民族关采自然就复杂。不过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中，有一种基本关系，这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是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条主线。这是因为，汉族自形成以来，在历史上就一直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活动中心虽然是中原地区，但人口却遍布全国各地。而少数民族则不一样，基本上都聚居于一个至数个或大或小的区域范围内，而且大部分是在边疆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错聚居，在地理上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辐射型民族关系网。因此，无论是全国范围，或是区域性范围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历代都发生直接联系，存在各种密切交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我国的统一之所以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聚合力之所以逐渐增强而不是减弱，就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5页)，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各种交往从未间断过。例如，在经济上，古代中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冶金、制陶、养蚕缫丝等方面发展最早，而少数民族生活的边疆地区，在畜牧业生产技术方面则居领先地位。汉族和少数民族有着各自的经济优势，加之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于是民族间不断进行着各种形式的经济联系和物资技术交流。汉族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逐渐传入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经验也不断传入汉族。经济交流的结果，不仅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且奠定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坚实基础。又如，在文化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从来就是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除各具传统和特点外，都吸取了对方的精华。正是各民族人民在文化上的交光互影，相互借鉴，中华民族的文化才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文化的长期交流，是形成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一条纽带。

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起来的，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统一国家，共同发展祖国经济，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共同开拓和保卫祖国疆土的奋斗过程中，逐渐培育出来的。如果没有上述诸因素的长期影响，没有历史发展合力的作用，也就不可能形成今天这种谁也离不开谁的兄弟关系了。

历史发展使汉族和少数民族越来越需要互相依存。但是，“两个离不开”关系的最终确立以及它在内容上的丰富和发展，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团结奋斗、建立新中国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新中国诞生后，随着民族压迫制度的彻底废除，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关系，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政治方面看，在民主革命阶段，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开始平等联合，团结奋斗，共求解放，共建国家。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指出:“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之下，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因而，“两个离不开”就迈向了更高的目标，即各族人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合作，互相帮助，共同维护和发展祖国的统一事业。毛泽东同志说:“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4页)汉族也极大地帮助、支持了少数民族。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播下革命火种，到人民解放军和汉族工作干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同兄弟民族人民一道，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等，就是最好的证明。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治上的互相帮助，有力保证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日益巩固与发展。

从经济方面看，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共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基础上不断密切。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

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事业，只有通过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单靠汉族或少数民族都是办不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上均有各自的有利条件和不足之处。汉族地区虽然人口多，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少数民族地区丰富。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则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大，蕴藏着各种丰富的资源，有地下的矿藏，地上的森林、草原等，这些都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统济的自然条件。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尚待开发，技术力量不够，资金也不足，如果没有汉族的帮助，也是不可能发展的。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必须携起手来，互相帮助和支持，而且也只有将各自的优势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互补充，才能扬各自之长，补各自之短，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汉族经济发达的省、市与少数民族的省、区，结成对口支援和互相协作、横向联合的关系，从而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邓小平文选》第172页)这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文化方面看，在新历史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互相离不开的关系，也由于建设高度的社全主义精种文明这一历史任务而越来越密切。发展各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各民族的科学和思想文化水平，除各民族自身的努力外，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各民族间，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学习、交流、支持和帮助。以学习语言文字为例，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汉语文历来是汉族广大人民进行生产活动、社会活动与科学实验的重要交际工具，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文字之一，因而各少数民族学习和掌握汉语汉文，就成了发展本民族科学文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汉族来讲，要诚心向少数民族学习和真正帮助少数民族，也必须学习和掌控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所以党和医家积极提倡各民族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和文字。为此，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这一点今天还为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认。

总之，“两个离不开”高度地概括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本质特征，深刻地揭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内在联系，充分地体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利益，是一个经过历史长期检验的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我国各族人民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及党的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很快便认识和接受了这个真理，并且成了自已在实践中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行动指南。

但是，现在也有少数人在思想上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如有的人对来疆参加开发、建设的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们，不仅不表示欢迎，而且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有的人甚至提出“反对各类人员进人新疆”的错误主张，等等。这些都是与“两个离不开”思想背道而驰的，是违反党和国家对内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的，是不符合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的。这些错误如不及时克服和纠正，必然要妨碍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影响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损害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事业。正因为如此，这些错误一出现，便遭到全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反对。